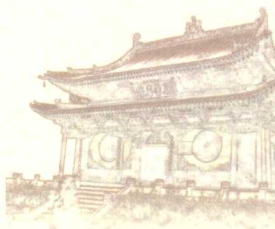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文丛



佛典 与南朝文学

Fodian Yu Nanchaowen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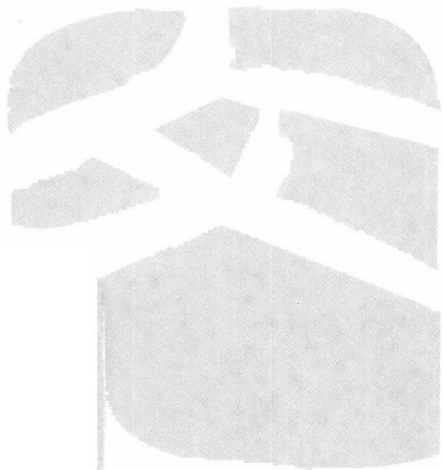
龚 贤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佛典与南朝文学

FODIANYUNANCHAOWENXUE

龚 贤 /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典与南朝文学/龚贤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 - 7 - 210 - 03840 - 5

I. 佛… II. 龚… III. 佛经—影响—古典文学—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B949.2 I 20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7803 号

佛典与南朝文学

作者:龚贤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 - 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3840 - 5

定价:33.0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佛典与南朝文学》是龚贤同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对南朝流行的三部佛教经典(《维摩诘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的译传、其内在文学性进行了考察,并对佛典于南朝文学及文论的影响作出了深入的综合性研究。

自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于传统的东方文化造成深入的刺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发生巨大的变迁。外来异质文化的注入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且促使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从内部生发出裂变,文学想象的空间被开拓,文学体式被更新,文学的内在意蕴得到扩充,中外文化的融合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学呈现出奇异、烂漫、绚丽多彩的风姿。这种深刻的思想与文学变迁,与佛教典籍内在的文学性有着深刻的关联。

关于佛教典籍内在文学性及其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有所关注,前辈学者颇不乏精深独到的论述。然而筌路蓝缕之功,难免偏重于总体的描述与概说,尚有待联系具体的佛教典籍、针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实践、分别文学体式的异同,作出深入具体的剖析,并从中引出历史文化与精神应有的启示。

由于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性格、文化心态,其实并非因袭静止、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有所继承又有所蜕变,这既有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取决于时代所提供的思想与文化资源的损益。佛教输入中国以前,我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资源,一是儒家为主体的对于现实人生(此岸世界)伦理秩序的构想与阐说,二是道家思想

为主体的对于生命形体存在(包括长生修炼术)的构思与阐说。我国古老传统文化中虽有关于鬼魂的概念,有着关于鬼神境界(彼岸世界)的猜想,但是并不发达。然而佛教东渐,将另一个古老民族的思维与想象资源输入中国,这就仿佛推开了一道天窗,人们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心灵的世界便被极大地拓展了。佛教将人生的序列划分为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前世的修行可以得到后世的果报。在空间的序列上世界则被划分为地狱、人间、天堂,世上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又各划分为若干天(欲界有六天,色界有十八天,无色界有四天)。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千个世界称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大千世界。佛教对于世界的这种阐释与解说,令传统质朴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对于人间万物,中国本有五行运转的观念,至此又输入六道轮回的思想。五行是抽象的观念,六道则有具体的形象。文学想象的空间由此而被极大地开拓、无限地扩充了。

佛教经典在中土迅速传布开来,其中《维摩诘经》《法华经》《大般涅槃经》尤其赢得南朝中土士人广泛的喜爱。维摩诘平日“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绕益众生”、“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他的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的形象给人们留下鲜明的印象。尤其是他的神通变化不可思议,他只住一人的房间却能同时容纳“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天人”(《问疾品》)、“其室广博悉皆包容三千二百狮子座,无所妨碍”(《不思议品》)。他既能运用神通力从遥远的香积佛处取来一钵香饭,又能“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沙世界之外”(《不思议品》),总之他的法力神通超越了一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样的形象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未曾有过的。《法华经·普门品》则“刻画了一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成为了后世在中国无人不知的神佛形象。正是由于佛教经典的广泛传布,它对于南朝士人、继而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影

响。

《佛典与南朝文学》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作者认为谢灵运的诗歌,“通过以山水为物质存在形式来探求佛性……将自然界中生命短暂的草木鸟兽都赋予了人的生命和气息”,“在《法华经》等的思想影响下,提升自己诗歌创作的精神追求与境界,创作了许多风调明净、颇富理致的山水诗”;认为佛典不仅丰富与充实了南朝志怪小说的题材与内容,而且使其在时空观上,“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在叙事性格上“这类小说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结合运用,大多采取限知视角,大量采用混合型全聚焦叙事范式”;又认为“佛典对当时文论的影响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得多”,认为刘勰“《文心雕龙》审美虚静说直接的近源是佛教禅学静观,间接的远源是老庄哲学主静观念”。这些阐说,既融会了前贤时俊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包含着作者自己静心思辨的感悟所得,对于深化学术、探讨真知,无疑是有益的。

龚贤同学于2003年秋天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我深感他勤奋好学,能够潜心研读古籍,尽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并能认真思考,必求其是。特别是翻译于千年之前的中世纪的佛学典籍,今天的青年人读起来会有许多的困难,而他能坚持不懈,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最终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因而受到审阅教授的好评。在他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这当然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希望他未来的道路愈走愈宽广。今值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高兴地写了以上的话,寄托我的衷心祝愿。

李中华

2007年12月7日

写于武昌珞珈山南麓寓所

目 录

序 言	1
------------	---

绪 论	1
------------	---

上编 佛经三典研究

第一章 《维摩诘经》	23
-------------------	----

第一节 翻译与流传	23
-----------	----

一、七译三存	23
--------	----

二、译文比较	34
--------	----

三、流传情况	43
--------	----

第二节 维摩诘形象	54
-----------	----

一、思想精义	54
--------	----

二、理想追求	60
--------	----

三、智慧与才能	62
---------	----

四、塑造手法	68
--------	----

第二章 《法华经》	70
------------------	----

第一节 翻译与流传	70
-----------	----

一、六译三存	70
--------	----

二、传布情况	74
--------	----

第二节 观音形象与《普门品》	86
----------------	----

一、观音形象的产生与发展	87
二、《普门品》与观音的救世品格	92
三、《普门品》的文体特色及影响	96
第三节 《妙法莲华经》的譬喻艺术	99
第三章 大乘《大般涅槃经》	111
第一节 翻译与流传	111
一、五存译本	111
二、四阙译本	120
三、传布情况	122
第二节 南本《大般涅槃经》的譬喻艺术	128
一、譬喻类型	129
二、譬喻喻义	134
三、见月与得鱼	141

下编 佛典与南朝文学考论

第四章 佛典与南朝诗歌	149
第一节 涅槃佛性与诗歌精神	149
一、涅槃佛性	151
二、《法华》净土	159
三、《维摩》思想	167
第二节 佛经转读与永明体的产生	174
一、汉语“四声”及永明体的产生	174
二、佛经转读	181
第三节 佛偈传译与五言、七言诗歌创作	189
一、佛偈詮说	189
二、五言佛偈与五言诗	192
三、七言佛偈与七言诗	199

第四节 佛经传译与宫体诗	207
一、宫体诗的产生与特征	207
二、佛玄合流	211
三、欲色异相	214
第五章 佛典与南朝志怪小说	221
第一节 题材与内容	221
一、观音信仰	223
二、因果报应	229
三、佛经故事新变	238
第二节 宇宙观与生命的时间观	247
一、宇宙观	247
二、生命的时间观	255
第三节 叙事特征	262
一、限知与全知视角	262
二、全聚焦叙事	270
第六章 佛典与南朝文	273
第一节 散文	273
一、佛典的艺术表现技巧	275
二、佛经翻译理论	284
第二节 辞赋	289
一、阐扬佛理	290
二、寓理于景	299
三、寺院与讲经	306
第七章 佛典与南朝文论	308
第一节 言意之辨	308
一、源流辨析	308



二、佛典与高僧的言意观	314
三、重玄与重佛	321
第二节 性灵说溯源	329
一、“性灵说”的产生及核心理论	329
二、佛性与性灵	335
第三节 《文心雕龙》	344
一、折衷原则	344
二、审美虚静说	354
参考文献	363
后 记	376

绪论

没有一种艺术不受到宗教的巨大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在儒佛道三教中,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原产于印度的佛教经典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经过汉魏西晋的初步传布,到东晋时期开始对文学产生显著的影响。时至南朝,这种影响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方面延伸。而这种影响又与佛典本身的文学性密切相关。本书就探讨南朝最受欢迎的三部佛典——《维摩诘经》、《法华经》、大乘《大般涅槃经》的文学性;并考察佛典对南朝文学的诸种样式——诗歌、小说、文以及文论的影响。

一、政治经济背景概述

南朝,史学界一般认为从宋武帝刘裕代东晋称帝的永初元年(420)起,至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陈后主叔宝祯明三年,589年)隋灭陈止,经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时约一百七十年。南朝四个朝代皆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当时于中国北方建立的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相对应。南朝四个朝代历时相对较短,其中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迭较快的一段时期。^①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3—266页。

在政治方面,南朝的门阀世族由盛而衰,东晋时期国家权力由世族与皇族共享,到南朝实现了皇权对整个国家的支配。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建立南朝的封建皇帝均出身庶族或细门。他们凭借军功而攫取最高统治权。如刘宋开国君主刘裕少时伐获新洲,齐高帝萧道成自称素族,梁武帝萧衍与萧道成同族,亦非高门。陈武帝陈霸先,始仕为里司,再仕为油库吏,可想而知其出身之寒微。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给高门大族以重大打击,为凭军功出身的寒门素族的升迁开辟了道路。如刘宋的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沈庆之、到彦之等;萧齐的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萧梁的陈庆之、陈伯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王琳、杜龁等;陈的侯安都、周文育、黄法氍、吴明彻等。他们“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依赖”。^①二是“世庶天隔”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一方面,南朝出现了寒门出身典掌机要的中书舍人、控制地方的典签、统率军队的将领,从而打破了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尽管东晋以来的门阀世族的显赫地位开始衰落,但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仍保有很大的优势。他们依靠门荫和特权“平流进取,坐致公卿”^②。在社会生活上,世族与庶族之间不能通婚,许多方面仍然是“世庶天隔”的状况。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南朝形成了权力的某种平衡,并出现了几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如刘宋元嘉(424—453)、齐永明(483—493),梁代从天监至大同(502—545)。

在经济方面,南朝在东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并扩展到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使江南的农业生产逐步由粗放型向精耕型转变,江南的经济重心地位于东晋形成并在南朝时期得到

①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8页。

巩固。整个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据史书记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死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姑熟饶旷，荆河斯拟，博望关畿，天限严峻，龙山南指，牛渚北临，对熊绎之余城，迓全琮之故垒，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薨，阡陌如绣。”^②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较大程度的繁荣，为文化思想领域的生机和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和条件。

二、文化思想背景概述

在意识形态领域，南朝形成释儒玄道兼容、激荡的活跃局面。

原产于印度的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一般认为从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开始。事实上，佛教在两汉之际已经传入内地，至东汉末年已蔚为大观。桓、灵之世，安世高、支娄迦谶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安世高译经中最重要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道地经》等，介绍佛教的一些基本原理与修行方法。支谶译经中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无量清静平等觉经》《般舟三昧经》等，为当时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局面，催生了“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以形为劳，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合适

① (梁)沈约：《宋书》(第五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0页。

② (唐)姚思廉：《陈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页。

的土壤。特别是魏晋以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坍塌、玄远清谈之风流行,更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佛经翻译进一步发展,《高僧传》记东吴支谦译经四十九部,《开元释教录》厘定康僧会译经七部。安世高、康僧会之学说主养生成神,与中土道教相近,上承汉代佛教。支谶、支谦之学说主神与道合,后来与玄学合流,开启两晋以来之佛学。

两晋时期,许多朝野名士不仅崇尚玄学,而且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晋元康元年无罗叉、竺叔兰二人译成《放光般若经》三十卷,般若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维摩诘经》亦与之相辅而风行。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竺法护翻译了大量的大乘佛经,其所译经典,《高僧传》记有一百六十五部(《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为整个汉晋译经最多者。其译的《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正法华经》都是大乘中的基本经典,还有《华严》《宝积》《大集》等经的支分别译,这些佛典对理解《般若》起了很大的作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就与黄老并称,到两晋时期佛教义学发展为般若思想,与老庄之学发展而来的玄学和清谈合流了,于是般若与玄学、沙门与名流相结合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如《高僧传》载支孝龙常披味《小品》,与阮瞻、庾颢、谢鲲、胡毋辅之、王澄、光逸、董昶为知音之交,世称“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胡服、被绛罗?’龙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①。表现了西晋清谈家冲和恬淡的风尚。但清谈家有家俗之累官宦之拘,沙门却可以无太多顾虑、言行相应而更为世人尊重。西晋般若学初兴,“格义”以解经旨,于是有沙门比拟名流之说,如孙绰《道贤论》将竺法护、帛法祖、竺法乘、竺法琛、支道林、于法兰、于道邃等七位高僧比拟为

^① 《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大正藏》卷五〇,第346页下。

“竹林七贤”。^①

佛教在历时一百余年的东晋形成南北两个区域。北方是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及夏、成(成汉)等十六国,这些区域的统治者,大多数提倡佛教来巩固其统治,其中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为盛,尤其是二秦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代表人物为释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东晋王朝延续西晋文化,佛教随着当时名僧不断的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个佛教中心,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庐山东林寺是东晋佛教的中心之一,主持者慧远。慧远自然历史地成为东晋佛教领袖,对东晋南朝佛教贡献卓著,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巨大。东晋佛教中心还有建康的道场寺,其时大多士大夫皆崇信佛教,所以建康佛法甚隆。东晋朝廷中奉佛者亦多,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等都礼敬沙门,元帝曾“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成帝“至意冥通,圣德遐感,造中兴、鹿野二寺,集翻经、义学千僧”。^② 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③。东晋咸康五年至隆安年间的“沙门应敬王者”之争的最终结果是沙门并未敬王者,此为建康佛教盛极一时奠定了基础。

东晋时期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其中心,逐步由浅入深、由偏而正地发展。其时玄佛的合流也因为名僧与名士的频繁交往而日趋紧密,佛学中的许多概念常常借用玄学术语。玄学家们也依附佛教经典,钻研佛理,使佛学和玄学糅混起来。于是中国僧徒中间,亦如玄学出现不同观点一样,出现了中国佛教史

①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第1812—1813页。

② (唐)释法琳:《辨正论》卷三,《大正藏》卷五二,第502页下。

③ (梁)释僧祐:《弘明集》卷一二,《大正藏》卷五二,第76页下。

上的“六家七宗”，“六家”即：道安、法汰、竺法深的本无义；关内的即色义，支道林的即色游玄义；于法开的识含义；释道壹的幻化义；竺法蕴、支愍度、道恒的心无义；于道邃的缘会义。“六家”中本无家有两说，所以合称“七宗”。佛教东传在中土得到不同观照。玄学亦可用佛教义理来阐释，从而使二者在哲理上相互通融。所以，般若性空之正义直到罗什综合《般若》经论而建立毕竟空义才得到真正阐发。

本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修持方面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勒净土(兜率)的思想，其创始人为释道安。道安每与弟子法遇、昙戒等，同在弥勒像前立誓，发愿往生兜率。稍后，又出现了一种期求往生弥陀净土(极乐)的思想，创始人竺法旷。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①。大力弘弥陀净土信仰的是慧远。慧远早年未出家之前就博综六经，善庄老。年二十一出家，年二十四讲实相义，引庄子义为连类，使疑昧者解喻。东晋元康元年与弟子等入庐山，时刺史桓伊为其建东林寺。他于讲授佛理之外，常讲儒书。殷仲堪入山同他共论易体本要。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同执卷承旨。周续之、雷次宗同受诗义于慧远。佛陀跋陀罗由长安到庐山，慧远请其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使庐山禅法知名一时。慧远于元兴元年与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一百二十三人于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专修念佛三昧，共期往生西方弥陀净土。慧远对东晋佛教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对南朝佛教的弘扬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力图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理及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起来。其创立的“神不灭”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宣扬的形死寿尽而神不灭，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为中国佛教奠定了牢固的神学基础。另外，观音信仰此时期亦为流行，据《高僧传》载，祈愿

^① 《高僧传》卷五《竺法旷传》，《大正藏》卷五〇，第356页下。



观音而得到感应的有法显、慧虔、法纯、帛法桥及邵信等。此外，禅法自汉代安世高传授之后，到晋代习禅者渐多，以越、蜀两地为盛，以习禅为业的有竺僧显、帛僧光、竺昙猷、慧嵬、支昙兰等。东晋时期智严、佛陀跋陀罗等先后到南方传习禅法。

南朝宋、齐、梁、陈各朝对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上层统治集团及一般文人学士大多崇信佛教。刘宋诸帝皆崇佛，以文帝义隆为最。孝武帝刘骏也尊崇佛教，他宠信僧人慧琳，让他参与政事，时称“黑衣宰相”（《南史·慧琳传》）。^① 萧齐帝室也崇信佛教，高帝道成曾幸庄严寺，听僧达讲《维摩诘经》。武帝赍于华林园设八关斋戒，尤其是武帝长子萧长懋和次子萧子良以崇佛闻名，子良从事佛教义理讲说，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时荆州名士刘虬亦精研佛理，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等，子良曾邀请他共同讨论法义。《南齐书·萧子良传》称之为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② 梁武帝时达到南朝佛教的全盛期。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天监三年）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重阁亲自制文发愿舍道归佛。他下令建的佛寺有爱敬寺、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并在光宅、爱敬、同泰诸寺造佛像。他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由群臣重金赎回，时称其为“皇帝菩萨”（《南史·武帝纪》）^③。这样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他重视译经，并亲自撰写佛教论著，著有大本《涅槃》《大品》《净名》《大集》等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他的影响下，其子萧统、萧纲、萧绎皆崇佛。到了陈代，建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之乱受到严重破坏，此期间亦多修复。陈武帝霸先曾舍身大庄严寺，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广流《大品》，尤敦三论”。^④ 其后的文帝蒨、宣帝顼、后主

① （唐）李延寿：《南史》（第六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4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第三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98页。

③ （唐）李延寿：《南史》（第一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6、219页。

④ 《续高僧传》卷一《释法泰传》，《大正藏》卷五〇，第431页上。